

新聞自由與現代化

朱立*

《本文節要》

促進現代化的方法、步驟當然很多，但從社會思想與資訊流通的角度看，新聞自由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作者認為，現代化即為不斷適應變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民主、科學是不可或缺的元素；而新聞自由則又和民主、科學是分不開的、相輔相成之要素，藉此強調新聞自由與現代化的關係。

最後，作者以為，大陸、香港和台灣的現代化是分不開的，新聞自由雖然不可能解決三地的問題，但是新聞自由可以讓三地的人民和政府，透過理性的手段，來為所有中國人探索現代化的大道。

壹、前言

「五四，祝你生日快樂」是國立高雄中山大學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主題。其實，五四的生日一點也不快樂；生於憂患，長於動亂的五四是快樂不起來的。

一九二八年五月，胡適在上海光華大學演講紀念五四運動九周年。他說，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政府能幹而清廉，政治有中年人操心，年輕人則看球、打球、唱歌、跳舞、談戀愛，盡情地享受青春；但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政府無能、貪污腐敗，中年人把持政權，青年人便要為政治操心，甚至得上街遊行，要求改革、要求革命了。非常不幸，

*本文作者朱立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

胡適所說的「不正常社會」正是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的寫照。

清朝末年，政府是腐敗無能的，保皇黨也好、革命黨也好，都是熱血青年所組成的。辛亥革命得以成功，是青年人在使命感驅使下奉獻血汗的成果。滿清雖倒，民國雖立，但腐敗無能的不正常社會却依然存在，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便是這樣爆發的，青年人的口號是「外抗強權、內除國賊」、「民主救國、科學救國」。七十年後，青年人仍然不能像胡適所說的那樣享受青春，因為中國人的三個地方——大陸、台灣和香港都面臨著不同程度的動盪，年輕人仍然得上街遊行，仍然嘶喊著和七十年前幾乎一樣的口號。在大陸的北京、上海、武漢等大城市，數十萬的大學生、知識份子紛紛上街遊行，要求民主，要求一個廉潔而有效率的政府。就在今天，北京便有紀念五四的大遊行，學生領袖吾爾開希等更寫下遺書，準備犧牲自己，用年輕的生命來「替其他母親的兒子謀幸福」。「浴血民主」是大陸上示威遊行學生打出的大橫幅，五四已經七十年了，國家的進步有限，口號却更悲壯了！

在台灣，報禁、黨禁均先後解除，民主方才起步，但社會秩序混亂、價值標準顛倒，外交的困境，大陸中共制度的威脅，使得台灣的發展也蒙上了陰影。顯然，台灣的社會也不是個正常的社會，雖然年輕人沒有走上街頭，但似乎也無法完全無憂無慮的享受經濟發展的果實和青春。

在香港，經濟向來繁榮，社會也相當穩定，但那却是不平等條約下的結果。一九九七年，香港便要回歸中國，但這個遠景所帶來的不是喜悅，而是恐懼；因為她將要由一個享有自由與繁榮的地方，回歸到一個自由與繁榮都極低的中共政權之下。「大陸有民主，香港才有前途」，已成了香港市民的共識。因此，當大陸的青年學生上街遊行，呼喚自由、民主的時候，香港的年輕人也上街了，他們在中共新華社香港分社門前示威遊行，支持大陸的民主運動，也為香港的未來爭取民主。

生日應是快樂的時候，照理我們應該舉行花車遊行、開舞會慶祝才是，但是在五四運動七十年後，大陸的學生要冒生命的危險遊行，香港的學生也要大力聲援，而在台灣也得舉辦如此嚴肅的討論會，這說明了中國人的社會實在比七十年前好不了多少。

五四的生日快樂不起來，主要的原因就是七十年前的口號「民主、科學」沒有實現。在現代化的歷程上，大陸是倒退的，香港則是有進有退，台灣則要在前進中不跌倒，嚴肅而又正確地和香港、大陸的中國人社區聯繫起來。

現代化的方法、步驟當然很多，辦教育、發展經濟、科學、講民主等等都很重要，但怎樣才能達到這些目標呢？從客觀的角度看，從社會中思想與資訊流通的角度看，新聞自由便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有了它，現代化未必成；沒有它，現代化一定不成！

貳、現代化的涵義

任何的社會都不是靜止不動的，因此所有的社會都得不斷地去適應新的變動，希望在變遷中求取穩定，這個不斷調適變遷的過程便是現代化，是任何社會都需要面對的問題，先進的國家如英國、美國要面對它，落後的國家如中國大陸、印度、非洲各國更需要面對它。

在這個不斷調適變遷的過程中，任何的社會都要經歷三個層次的變化：

第一是器物技能的現代化。這個層次的現代化指的是運用科學、技術來改善我們的生活品質。例如，最早期的人類社會的交通是靠步行，接著才運用牛、馬，而後又有車、船乃至飛行器的發明與運用。以能源而言，最初只有火石、木材，而後才有煤炭、石油、煤氣、電力、核能等。隨著科技的發明，這些器物技能的運用也增加了，它們改善了我們的生活，也拓展了生活的領域和視野。

現代化的第二個層次是制度的變化，它指的是社會、文化、經濟與政治等關係的變遷。以社會關係言，最早是以家族為中心的小社區，感情和血緣維繫了關係；後來則演變為以契約行為所維繫的大都市社會，法律與組織變得重要了，家族的影響弱了，小家庭成了主要的單元。以文化言，同一習俗、道德標準的單元社區變成了習俗互異、道德標準也不同的多元社會；在單一的社區裏，文化是統一的；但在多元的社會裏，文化則是五花八門，甚至古靈精怪的。以經濟關係言，最早期是自給自足的農牧社羣，到了工業社會，則貿易以互通有無成了經濟的主體，而在後工業社會則又以生產資訊為經濟之主體。以政治關係言，神權政治下是做神之名而治人；而皇權時期之人治，則權力是世襲的，雖下愚亦可為王；到了法治時期，權力的分配有規則可循，人人皆有機會去競爭。制度層次的變化雖未必是直線前進式的，但所有的社會都面臨了如何變、怎麼變、何時變的挑戰。

思想行為層次的變化是第三個層次的現代化，這個層次的變化最難、最慢，因為它關係了整個社會的最深層結構和信仰。大陸有最尖端的科技、豪華的觀光大飯店、也有法院，但在行為思想上却仍然有帝王思想，仍然是四個堅持，正是此一層次變遷緩慢、艱難的佐證。

現代化的三個層次未必是同時並進的，器物技能的運用固有先後之別，但相對而言，它往往是最先出現的。不過，有時制度的現代化也可能先於器物的現代化，而思想行為的現代化也可能先於制度、器物。當然，就是在同一社會中，各個層次的現代化也不

是完全一致的。在大陸上，店員身穿西服，但却無禮、也無服務之觀念。設備一流的觀光大飯店內，餐具可能殘缺不全，廁所也可以臭氣逼人，這是管理制度沒有建立、也無法建立的現象。在台灣穿西服著革履，而口嚼檳榔後便一口「鮮血」吐在地上；開的是進口的豪華車，但却不守法，搶紅燈、撞了人不是找警察，而是先發制人地吵架、打架；民主的制度建立了，但不少公職人員却以權謀私，當權者也不以民主方法辦事。和大陸、台灣相比，香港的情況要好得多，但至今仍有人希望「救世主」出現，反對建立民主制度，仍希望將權力鞏固在某一階層上。

器物的現代化要靠科學的不斷鑽研，而科學發達與否又和民主自由的程度有關。制度的現代化也離不開科學，離不開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等科學，而在科學的求真過程中，更得有大家共同遵守的原則，這也就是民主。思想行為的現代化要靠教育、靠資訊的流通。無論是器物、制度或思想行為的現代化，科學和民主都幫得上忙，而科學和民主又都需要傳播媒介在自由的情況下來推動、來維繫，這便是新聞自由和現代化的關係了。

叁、新聞自由與現代化的關係

從狹義的角度看，新聞自由是新聞從業人員在工作時所享有的自由，表現於「採訪、報導、出版、傳遞與批評」資訊等方面，是新聞傳播媒介所享有、運用的自由。其實，新聞傳播媒介享有新聞自由，乃基於一個廣義的定義上，那就是新聞自由是全民所享有的，是一種基本人權，而不是新聞工作這一種特定行業的特權。正因為新聞自由是全民的，新聞工作者才能夠自由接近消息來源、自由採訪、自由報導、自由傳遞。正因為它是全民的，它也不是絕對的，它受著社會上其他各部門的制約，在全民所公認的理性原則下運作。

人必須瞭解環境，掌握事物的條理，才能生存，才能適變、應變。這在傳統的小社區中如此，在現代的大都會中也是如此，所不同的只是人所需要瞭解的環境變得更大、更複雜了。在傳統的社區中，人認識環境、掌握條理的主要方法是親身經歷代代相傳的經驗，或是親朋好友間的口耳之傳。但在變遷之中，傳播工具的不斷演化，我們周圍的環境變大了、變廣了，事理也複雜了，只靠親身經歷或口耳之傳便非常不足夠了，於是我們便非得借助傳播工具不可，而傳播工具的出現與不斷更新，我們所需認識的環境也隨著變得更大了。加拿大籍的傳播理論家麥克魯漢說：「傳媒是人感官的延伸」，正是此理。有了傳媒，我們看到了肉眼看不到的東西，聽到了耳朵聽不到的事情。傳媒延伸

了我們的感官，傳媒也同時擴張了我們必須面對的環境，也幫助我們來瞭解這逐漸擴張、變大的環境。

要看得遠，便不能矇著眼睛；要聽得清楚，也不能搗著耳朵。傳媒既是我們感官的延伸，我們也就斷無矇著或搗著傳媒的道理，因此傳媒便必須擁有自由，有自行決定看什麼、聽什麼與怎麼看、怎麼聽的自由，否則傳媒便只能偏聽、偏看了，而傳媒偏聽、偏看，甚或看不清、聽不見，也就等於我們自己偏聽、偏看、看不清、聽不見一樣的可怕和危險了。

現代化是一種不斷適應變遷的過程，要能「適應」，首先便得對社會上發生的事有廣泛而正確的認識，這對個人、工商機構或政府部門都是如此。對個人言，人人各有工作，各有興趣，無論時間、財富多寡都不可能鉅細無遺地去觀察、認識社會。工商機構或政府部門，縱使財力雄厚、人手充足，但社會上的事情畢竟「億頭兆緒」，掛一漏萬的情形也必然難免出現。傳播媒介的職責便是搜集、報導、傳遞、資訊，正好可以扮演耳目的角色，彌補個人、工商機構或政府部門「資訊」活動之不足。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我們這個世界有三個「現實」，一個是存在於個人腦海中的「主觀現實」(subjective reality)，一個是傳播媒介中所呈現出來的「媒介現實」(media reality)或「符號現實」(symbolic reality)，另一個則是存在於客觀世界中為個人或媒介所觀察、取捨的「客觀現實」(objective reality)。由於「客觀現實」太大、太雜，「主觀現實」和「媒介現實」無論如何不會「等於」「客觀現實」，兩者不是放大、便是縮小了「客觀現實」，差距如果過大，便是認識不清。而「主觀」與「媒介」現實雖不等於「客觀現實」，但兩者却都在「客觀現實」中產生效應，因此，三種現實之間的互動是連續不斷的，而三種現實間的差距則愈小愈好。「客觀現實」中有真相、亦有假相，要識真破假，便得容許個人和傳媒有觀所欲觀、解所欲解之自由；如此，三種現實間的差距才會減少至最小的程度，人和傳媒才不會變成井底蛙或自大的夜郎，社會才有不斷適應變遷的能力，才不會停滯不前。

民主和科學都是理性的處事方法，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兩者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適應變遷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認識環境與選擇適應方法的過程中，人們必定會有不同的看法，甚至還可能發生衝突，有了衝突便得解決。由於民主是一種程序，建立在公開、參與、平等、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容忍少數等理性的基礎上；因此用民主的方法解決衝突是非暴力的，不致於對社會造成破壞。社會的資源，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感情都得加以分配，分配不均固然會造成問題，但分配不公的問題則更大。民主沒有擴大資源的能力，但由於民主是一個公開、參與的過程，它却可將「不公」減至最低或可忍受

的程度；因此，民主的社會是安定的，在適應變遷的過程中也是和平的。

政治是管理衆人之事，因此便一定要有政府，政府要制定政策，這便是上情下達和下情上達的工夫。政府也有責任使貨暢其流、人盡其才、地盡其用，這便得靠東情西達、南情北達了。在這些活動中，傳播都是不可或缺的主角，而搗著耳或矇著眼的傳媒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

科學是認識環境、掌握環境的一套系統方法，不因自然界或人類社會而有所不同。科學的方法固然得靠學校教育來教導、培養，但也得靠一個講科學、不迷信的社會做基礎才行。科學的發明對於人類適應變遷、解決問題有莫大的幫助，如器官移植、生物工程當然可以造福人類，但運用不當也可破壞生態平衡或予壞人以可乘之機。要使科學爲人類謀福利，要防止科學發明爲野心家所掌握，科學研究也得接受監督，而這又捨民主與新聞自由不可。

科學家固然有其固定的工作場所，也有其發表研究成果的園地，但科學家也是人，他們也需要認識環境，也需要在「主觀」、「客觀」、與「媒介」三種現實中定位，如此才不致閉門造車，才不致迷失科研的方向。另一方面，科學研究的發現也可能引起爭論，不易判斷是非的情況也一定會出現，民主和新聞自由便能保證大家做理性的爭論，而不爲主流所接受的發明或見解也會受到容忍。

科學發明中有不少與傳播有關，新的傳播科技可以使我們更快、更準確、更廣泛地傳遞資訊，而這些科技也有助於維護自由與民主；當然，傳播科技也有助於科學發明的交流與傳播。

現代化是不斷適應變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民主和科學是不可缺的元素，而新聞自由則又和民主、科學是分不開的相輔相成之要素。

肆、新聞自由與中國的現代化

中國大陸、香港與台灣是中國人居住的主要地方，三地的制度互異，現代化的經驗不同，新聞自由的發展歷程也不一樣。

在中國大陸，新聞媒介被認爲是執政共產黨的工具，是宣揚與執行中共意識型態與政策的工具。在中共的意識型態中，傳播媒介的「黨性」高於一切，傳播媒介的任務是隨著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而轉移的。因此，在中國大陸所有的傳播媒介都由共產黨監督、經營、操作，它最重要的任務是執行黨中央的政策，而不是提供人民大眾想知道的資訊，也不是提供人民大眾所需要的娛樂。傳媒提供資訊和娛樂的功能，一直到一九八〇

年代才獲得承認。

中國大陸的傳媒也被賦予了監督、批評的任務，但這個任務却不是傳媒可以自主地擔當起來的，它需要在共黨的領導與許可下才能執行。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曾經在一九五〇年代的一篇講話中指出，傳媒應八分報導光明面，二分報導黑暗面。雖然中共傳媒的重要負責人都是級別不低的黨員，但在處理揭發黑暗面的過程中却是沒有自主權的。一篇批評的文稿便得過「三見面」的關，要由被批評者單位的黨委批准、要由被批評者上級單位的黨委批准，也得由傳媒所在地黨委的批准。在這種嚴限下，批評與監督是存在的，但對象却是蒼蠅遠多於老虎的。

中共政權於一九四九年建立，四十年的現代化歷程中，真是血淚斑斑。一九五六年公私合營下，私營企業不見了。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之後便是反右，成千成萬的知識份子成了抬不起頭的右派份子；同時期的人民公社、大鍊鋼、大躍進、再加上自然災害，經濟倒退了，死難的人數更在好幾千萬之上。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經濟上又放鬆了，但一九六五年中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全國「抓革命、促生產」下，泛政治化了的文化、經濟與社會都變得呆滯不前了。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文革的主將「四人幫」等垮台，華國鋒繼承了沒有文革名義的文革政策。一九七九年底，鄧小平復出掌權，推出了改革開放的政策，政治、社會、文化都有了復甦的生機，雖然中共仍然牢牢地掌握了一切的社會組織與機構。

十年改革期的中共領導說，人民公社搞早了，反右擴大化了，大躍進其實是勞民傷財的大躍退，而文革則是一場「浩劫」，這一連串的失敗都是中共適應變遷過程中所制訂的政策，傳媒不是該監督批評、提出警告嗎？但在中共的體制下，傳媒非但沒有提出警告，反而全心全意、甚至瘋狂地支持、鼓吹。現在傳媒當然在支持、鼓吹開放與改革，批判過去的極左政策，但無論是批判或是鼓吹，傳媒都是奉命辦事的。

中國大陸的人口多、問題複雜，這當然是事實，但大陸沒有新聞自由、傳媒沒有自主的個性，使得傳媒非但不能提出警告，反而又使問題更加惡化了。十年改革中也汲取了過去的教訓，但在新聞改革的討論中却一再強調，改革是要加強黨的領導，而不是放棄黨的領導，是要「更好地宣揚和執行黨的政策」。

中共的傳播制度當然有它的長處，那就是所有的傳媒可以組織起來為「適應變遷」的政策效力，但非常不幸，中共「適應變遷」的政策却是錯多對少的，而且是大錯特錯的。大陸的知識份子對此也有所反思，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法學界的于浩成與社會科學院的孫旭培等，便提倡訂定新聞法來保護新聞工作人員、提倡研究新聞自由對於政治與經濟發展的貢獻、提倡人民有知情權、提倡傳媒應發揮輿論監督的功能。一九八六

年底，大陸有一百多所的大學生上街示威，今年四月的學運都先後提出了「新聞自由」的口號，要求讓新聞媒介說真話，這些都是大陸知識界的反思，這也是新聞自由有助社會「適應變遷」、減少動盪、促進安定的證明。

香港位於大陸的南端，自一八四二年起便是英國管轄的殖民地，一九四九年後，它成了避赤亂的天堂。英國是個講民主、重自由的國家，但香港却向來沒有民主，雖然它享有相當高的自由。不過，這却是矛盾下的產物。管制傳播媒介的條例是嚴苛的，但在執行上却是寬鬆的。一九五〇年綜合刊物管制條例規定，傳媒如發佈假消息而引起恐慌，便得受罰、停刊，這個條例只引用了一次，在一九六七年前左派發動暴動時，查封了三家左派報刊。一九八六年底，香港政府修改此一條例，取銷了出版報刊需繳登記費的規定，但却將管制發放虛假消息的條款移至「公安條例」第廿七條，雖羣情洶湧反對，但政府控制的立法局依然公佈實施，直到一九八八年底才行撤銷。

香港新聞自由的經驗也有污點，在電影檢查條例中，一向訂有政治檢查的條款，曾有二十多部「可能妨害與鄰近國家友好關係」的影片被禁。不過，總體而言，香港的新聞自由程度是很高的，除了受普通法律的約束外，幾乎毫無禁區。香港能享有新聞自由，這固然拜英國民主與自由傳統之賜，但香港本地的社會政治因素也是新聞自由得以維繫的主要因素。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近二百萬的人民南逃，對於這些難民而言，生存是首先考慮的問題，批評政府、爭取自由則成了次要的事了。同時，和中共控制下的大陸相比，香港的生活雖苦，但却是無慮匱乏的。在精神生活方面，香港也沒有什麼禁忌，基本上思想是自由的。

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難民，他們人在香港，心却在大陸，他們固然關心本地的情況，但更牽掛住在內地的親人和鄉土。香港雖是他們安身立命之所，但他們對香港關心遠遠不如他們對大陸的關心。這種心理也反映到了傳媒之中，使得傳媒對大陸中共和台灣國民政府的批評嚴苛，而對香港政府的批評溫和。國共的熱戰雖已在一九四九年結束，但國共間的筆戰却仍在傳媒之中繼續。對大陸南下的報人說，國共的事務遠遠重要過香港的事務，更何況相比之下，香港事務又遠比國共事務可攻擊之處為少。

除了國民黨支持的「香港時報」、共產黨支持的「大公報」與「文匯報」等之外，香港的傳媒基本上是非政治化的，商業掛帥的第一宗旨是爭取讀者以謀取最高的利潤，在這個指導原則下，傳媒最明顯的立場便是「沒有立場」，經營則力求減低成本。記者、編輯的職責是填滿版面，爭取讀者，理想與野心無非加薪、晉級而已。

在這種政治與社會因素的影響下，香港傳媒的新聞方針基本上是非對抗性的，既然不和政府當權者對抗，新聞自由的用武之地和所受到的考驗便相對減少了。香港傳媒雖

然也有「對抗」的對象，但在香港政府的「緩衝」下，無論是國民政府或中共政權也都只能「望港興嘆」，徒呼奈何。不過，這些因素已在一九七〇年代中開始起了變化。

首先，以溫飽與安定為主要目標的難民心態逐漸消失了。大陸的中共政權並沒有因為人們的厭惡而有垮台的跡象，而第一代的難民老了，第二代的生命已經成長，由於大陸對外封閉的政策，以及文革的恐怖統治，他們對於香港的認同與歸屬超出了對大陸的感情。與此同時，香港的經濟也在石油危機和左派暴動後恢復了，社會治安與公共設施也在改善、增建之中，這些都加強了第二代對香港的感情，使他們對香港的事務更加關心。

和上一代相比，第二代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了，這些在香港或外地受過高等教育的新血也注入了傳媒之中。雖然傳媒的老闆仍然重視經濟掛帥，但讀者的教育水準提高了，兩者互動的結果，傳媒的內容起了變化，對本地重大事務的報導多了、也深入些了。

踏入八十年代，香港的前途成了公眾注目的焦點，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年，中共與英國談判如何安排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後的香港，傳媒的注意力也就自然而然地放到中國大陸和香港兩地的制度上了。接著，中共組織起草香港的基本法，以做為香港在成為中共統治下特別行政區的治理藍本。大陸沒有民主，也沒有新聞自由，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實，一九九七年後，香港能不能繼續享有經濟的繁榮和生活的自由呢？在這個未知數的陰影下，香港是戰慄不安的，於是房地產跌了、股票跌了、移民增加了！

在從英國殖民地過渡到中共統治下特別行政區的期中，在新聞自由庇護下的香港傳媒，充份地報導了中共與本地各階層的意向，民主的呼聲和反民主的嘶叫都透過傳媒傳播到六百萬居民的家中。同樣地，香港人對前途的疑懼也毫無保留地在傳媒之中得到了發洩。不過，香港未來的政制安排並不是一次理性的較量，它最終將取決於擁有政治權力的中共。然而中共大陸自己在摸索，自己的政制與新聞自由也在未定之中，香港又如何能安下心呢？這是香港所最擔心的，也是香港在「適應變遷」中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和大陸的極端控制與香港的高度自由相比，台灣「適應變遷」的經驗正好介乎兩者之間。當大陸的中共政權充滿信心地建立起來的時候，國民政府則正從連串的失敗之後在台灣奮力地站起來，為生存而掙扎。和香港一樣，台灣也從大陸湧來了二百多萬的軍人、平民，無論是對政府或在台灣的人民，生存是第一考慮。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強制以及傳媒的自我約束給台灣帶來了安定，使得經濟得以在安定中起步、成長，使得教育得以在安定中恢復、普及。由於美國的支持，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台灣也在軍事和外交上成功地阻止了中共一波接一波的攻擊。

不過，台灣的安定和成長也付出了昂貴的代價。首先，由於政府不能在大陸上行使

政權，原來在大陸上產生的政府、議會便面臨了無法改換的情形，國民大會的代表、立法院與監察院的委員便在這種情況下連任了四十年，雖然自一九七〇年初起便有了增補名額的選舉，但直到八十年代初止，這個體制基本上是不容批評、攻擊的。

不容批評與攻擊的還有執政的國民黨和黨政的最高領導層，雖然在五十年代有「自由中國評論」，雖然在七十年代後也有許多的黨外刊物對執政黨和政府的政策和制度提出批評或攻擊，但總體而言，「異聲」是微小的，也是不常聽聞的，而且論者也要面對極大的政治壓力。

執政的國民黨雖一再聲稱中華民國代表所有的中國，但台灣和大陸的關係基本上是不能談的，在中國大陸上所發生的事情也是經過濾後才能傳給大眾的，而大眾也不可能直接去認清中共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的前途——統一、獨立或維持現狀，都是不能談的禁區。

在傳媒的結構上，台灣雖然也有民營的報紙、電台。但基本上都是親政府、擁護執政黨的。電台、電視在執政黨控制之下，報紙的發行、印發的地點與張數也都有限制。雜誌是唯一的「缺口」，反政府的黨外刊物便都是以雜誌的形式登記出版的。

和香港一樣，經濟的發展、教育的普及與程度的提高，再加上第二代的成長，以及大陸在八十年代後的開放政策，台灣的情況也出現了變化。一九七一年，台灣被逼從聯合國退出；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大陸；一九七五年，老總統蔣中正去世；一九七七年，在選舉時中壢發生了暴動；一九七八年底，美國宣佈將於一九七九年元旦起承認中共政權，台灣中止了進行中的選舉；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高雄發生了美麗島暴力事件，事後有四十五位黨外人士被捕；一九八六年，黨外人士籌組民主進步黨；一九八七年，台灣地區解除戒嚴、報紙開放登記、民衆亦可赴大陸探親；一九八八年元月，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繼任總統；同年，台灣的記者打破禁令赴大陸採訪；一九八九年，記者正式被允許赴大陸採訪，而郭婉容也在五月四日在北京出席亞洲銀行會議。

報禁、黨禁與戒嚴的解除，使台灣的新聞自由邁進了「無禁區」時期，自總統以下的任何權威人物或象徵都可以成爲諷刺、嘲弄的對象，立法院中有名爲「肢體語言」的打鬥，街頭遊行中也有暴力行爲出現。傳媒針砭時政、人物之餘，自己也成了被批評的對象，妨礙司法審判、煽情、誇大不實、親政府、渲染反對黨的脫法行爲等等，各式各樣的批評都針對傳媒而來。反對黨成立了，一些新黨也成立了，而新報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一向受執政黨控制的電子傳媒也受到了民進黨的挑戰，透過直播衛星而來的外國廣播也傳進了地面的「小耳朵」，台灣的資訊活動空前的蓬勃，但也空前的混亂。資訊的戰國時代之後是和平呢？還是更多的動亂呢？這些都在困擾著台灣的居民！

香港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成爲中共統治下的特別行政區，台灣海峽兩岸敵意的消除，人民走訪的增加，這一切說明了「海峽兩岸」間的互動將有增無減，已開了的門再也關不上，資訊的衝擊是免不了的，誰也無法將之推於門外。香港、台灣和大陸在「適應變遷」的過程中多了新的變數，這個變數將使三地結合在一起呢？還是使三地更形分離呢？誰也不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無論三地喜不喜歡，資訊的互動、文化的交往是不可能消除的了。

伍、結論

現代化是任何社會都必須歷經的過程，沒有一個社會可以一成不變地去調適變遷所帶來的問題。新聞自由絕對不是萬靈丹，它不可能解決變遷所帶來的所有問題，但它卻可以幫助我們發掘問題，使我們不致蒙在鼓裏，而使問題惡化到不易或不可解決的地步。積極地說，新聞自由使人人可以無懼無束地暢所欲言，它可以鼓舞幻想、奇想、謬想，可以促進思想的蓬勃，有助於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由於新聞自由也容忍少數人的極端看法，用暴力解決問題的情況便會減少，社會才會有安定，而在安定中才能求進步，在進步中才能求安定。

在適應變遷的過程中，錯誤與挫折也是難免的。新聞自由可以幫助社會找出錯誤，減少錯誤；在挫折出現時，它也可以幫助舒緩、渲洩不滿，發揮心理治療的作用，而減輕社會在應變中所承受的緊張與壓力。

在應變過程中，大陸的傳媒一向受到了政治的強力束縛，但在八十年代已出現了力圖自主的可喜現象。香港傳媒受政治的約制最少，但隨著政治地位的變動，政治束縛的陰影却有愈來愈濃的跡象。在台灣，傳媒已經擺脫了政治的控制，而在八十年代中開始出現了自己獨立的個性，但在這個變動之中，却又有掉入商業陷阱中的可能，煽情與干涉司法的不負責報導、評論都不是正常的現象。大陸、香港和台灣在適應變遷的過程中，都面臨了新的挑戰，三地都走到了十字路口，是前進，還是後退，三地的精英和人民有責，三地的傳媒更加有責。

大陸、香港和台灣的現代化是分不開的，無論身處何地，我們都必須用「宏觀」的眼光，將三地的經驗連繫起來做整體的觀察。新聞自由不可能解決三地的問題，但新聞自由可以幫助三地「定位」，可讓三地的人民和政府透過理性的手段來爲所有的中國人探索現代化的大道。這不是件易事，但我們別無選擇，我們非這麼做不可。如此，我們才不必在紀念五四的時候長聲嘆息，才能歡欣地慶祝五四，從心底深處說聲：「五四，

祝你生日快樂！」

後記

這篇文章是根據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在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演講時的大綱整理而成的，距演講日整整四個月又九天。從四月十五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起，關心中國局勢發展的人，便守在電視機或收音機旁，不停地追蹤著在神州大地上爆發的全民民主運動。一九八六年底，中國大陸已經爆發過一次學生示威運動，先後共十七市一百五十多所大學參加，規模雖然龐大，但和今年的規模相比，則又瞠乎其後了。兩次的學運都有共同的口號：要民主、要新聞自由、打倒官僚。不同的是這次運動差不多全呈現在電視的螢光幕上，學生與市民的人數雖多，但理性、和平，深深叫人感動。雖然中共的官方喉舌「人民日報」將學生的和平請願定為「動亂」，雖然不少被激怒的學生都寫下了絕筆書，但海內外的中國人却充滿了希望，因為他們在中國青年的行為中見到了生機，只要中共肯稍做讓步，事件便會向好的方向演變。數年來飽受前景不明朗驚嚇的香港人都都綻出了希望的淺笑，雖然民主不可能一蹴可及，但只要方向走對了，大陸便有民主的希望；大陸有了民主，則香港回歸祖國又有什麼可怕、可懼呢？

我的演講就是在這種既有希望、又有疑懼的激動心情下完成的。離開高雄後，我又在台北停留了六天，出席「亞洲資訊化研討會」，返回香港已是五月十一日，我一頭又鑽進了報紙堆，努力地去從新聞報導中瞭解運動的發展，看電視、聽廣播成了每天不可缺少的主要活動。學生絕食了、北京戒嚴了、軍隊進城了、李鵬可能垮台了，我的心跟著電視上的鏡頭和收音機的廣播而跳動，「中共會不會真的鎮壓呢？」成了人們見面時的第一句話。香港沸騰了，十萬人冒著狂風上街支持大陸的民運，一百萬人又上街了，但這一切都沒有用。局勢一天比一天緊張，六月三日的電視傳來的已經是血淋淋的鏡頭；六月四日清晨，北京的戒嚴部隊在坦克車的掩護下向學生開槍了！一切的希望都破碎了。憤怒的心又爆發了，香港又出現了一次百萬人的黑色大遊行，哀悼北京的死難烈士，咆哮地譴責血腥誤國的劊子手政權。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是憂悽，淚水披面的人更比比皆是。交通流量減少了，餐廳的宴飲也減少了，辦公室和工廠的效率也降低了，國殤、國難當頭，又有誰提得起精神來做事呢？

六月的心情是黑色的，七、八月的心情也好不到哪裏去，溫和的領導人被鬥垮了，八位老朽的領導操縱了大局，支持和參加過民運的知識份子，被捕的、被捕的、逃亡的、逃亡的，人們期盼的轉機一點痕跡也看不到。在這種情況下，改革開放已名存實亡，民主的幼

芽給扼殺了，新聞自由又被指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東西，一切的改革停頓了，知識份子和善良的同胞又再次墜入了黑暗的深淵，在血腥的紅色恐怖中戰慄。

期望、悲傷、憤怒使我提不起筆來，新時局下的倒退使我猶豫如何下筆，於是一拖就是四個多月，而這篇文章最後還是保留了原來演講時的看法。人民的力量雖然沒有帶來期望中的改變，人民的力量雖然在槍桿子和坦克之前退縮了，但人民的力量也在人民心中播下了種子，挫折帶來的不會是失敗，挫折將會迎來更大的勝利。槍聲打垮了中共政權自己的基礎，「鎮壓學生運動的政權是不會有好下場的」！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三日，六四屠殺後一〇一日於香江警未居■